

陳寅恪與東方語文學

——兼論內亞史及語文學的 未來展望

孔令偉*

陳寅恪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其早年負笈歐美，遍學滿、蒙、藏、梵文，並曾在 1926 年返回中國後引介歐洲的語文學傳統。1928 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陳寅恪旋應傅斯年之邀加盟，可以說史語所自成立之初便與陳寅恪有著深厚的淵源。從 1928 至 1937 年間，陳寅恪在史語所任職期間曾藉由語文學方法積極開展多語種文獻的相關研究，以冀研究過往中國學者所未能處理之史學課題，諸如考訂《蒙古源流》，對勘梵藏多語種佛經，以及整理內閣大庫檔案等等，均為後人立下良好的學術典範。本文通過考察陳寅恪與傅斯年等學人之間的往來書信及其個人手稿，以及《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中的相關文書，對陳寅恪早年治東方語文學的心路歷程進行刻畫，並探討陳寅恪與史語所之間的學緣。

關鍵詞：內亞史、語文學、陳寅恪、傅斯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學系與歷史學系聯合項目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十八世紀以降，隨著西方諸國在中東與南亞等地的海外活動，歐洲學術界開始關注東方古文字的研究，並通過語文學(philology)方法，在研究東方古代歷史與文化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1786年英國東方語言學者瓊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發現梵文、古希臘文與拉丁文之間具有系統的關聯性，為印歐比較語文學奠定了基礎。¹1799年法軍在埃及發現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隨後為英國所得，並通過比較對應的古希臘文，得以破譯古埃及碑文，使得比較語文學在西方備受矚目，其在西方人文學界中的顯學地位，也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上半葉。²除了西方學術界外，日本在十九世紀末也隨著大量引進西學的時代浪潮下，開始重視語文學方法，成為東亞世界首先發展語文學的國家。語文學的傳入對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日本學術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又以東洋史學傳統的建立，為學林所稱道，並先後出現那珂通世(1851-1908)、白鳥庫吉(1865-1942)、內藤湖南(1866-1934)、羽田亨(1882-1955)等一批長於利用多語種文獻的東洋史學者。³十九世紀末以降日本東洋史學與傳統漢學不同之處，在於其對中原域外史料之重

¹ Garland Cannon, Kevin Brine, *Objects of Enquiry: The Life, Contributions, and Influences of 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4*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0.

² James Turner, *Philology: 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167-209.

³ 江上波夫，《東洋学の系譜》，第1集(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關於二十世紀初日本學界受到歐洲語文學方法的影響，當時的中國學人已有所認識，如傅斯年在1935年便曾謂：「二十年來日本東方學進步，大體為師巴黎學派之故。」傅斯年，〈論伯希和教授〉，收入傅斯年著，傅孟真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陳槃等校訂增補，《傅斯年全集》，第7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頁7。

視，如那珂通世譯注《蒙古秘史》；白鳥庫吉治滿蒙史；內藤湖南調查《滿文老檔》；羽田亨研究西域史地等，均為早期日本東洋史學重視內亞因素之例證。⁴二十世紀初內亞史與語文學的學術思潮，亦與中國近代的學術發展息息相關，其中又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以及陳寅恪(1890-1969)、傅斯年(1896-1950)等人的事業，影響尤其深刻。⁵本文通過使用陳寅恪、傅斯年等學人書信、札記並重點利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中的相關文書，從東方語文學(oriental philology)的維度考察陳寅恪與史語所之間的學緣，進而提出一些歷史學反思，並為內亞史和語文學的未來發展提出一些新的展望。

二、由考據學入語文學：羅振玉、王國維到陳寅恪

中文學界對於語文學的關注，主要始於羅振玉(1866-1940)、王國維(1877-1927)與歐洲以及日本學界的交往，其中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羽田亨等人針對敦煌文書等新出土多語種史料的研究，尤對出身晚清乾嘉學術的羅、王兩人產生了極大的震撼。隨著敦煌文書、黑城文書、內閣大庫與清宮舊藏等多語種新史料的問世，歐美、俄國與日本各地的歷史、考古與文字學學者紛紛開始利用語文學方法來研究這些新史料，就傳統中國及其周邊族群研究方面，取得了嶄新的成果。羅振玉與王國維在處理敦煌文書、黑城文書與內閣大庫等多語

⁴ 那珂通世譯注，《成吉思汗實錄》(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07)。
白鳥庫吉，《塞外民族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0)。內藤湖南拍攝，
《滿文老檔》(*Tongki fuka sindaha hergen i dangse* [即所謂《加圈點字檔》]，
1905 年盛京崇謨閣原版照片，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圖書館藏。)羽田亨，
《西域文明史概論·西域文化史》(東京：平凡社，1992)。

⁵ 張谷銘，〈Philology 與史語所——陳寅恪、傅斯年與中國的「東方學」〉，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7：2(臺北，2016.6)，頁 375-460。

種新史料時，敏銳地認識到了當時中國學術傳統的局限性。當時法、德、日、俄等國的東方學研究者，雖然對傳統漢籍的掌握不如中國學者，卻能廣泛地運用中國學者無法解讀的梵文、藏文、回鶻文、西夏文、蒙古文、滿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與察合臺文等多語文史料來研究中國史，並將傳統中國史的研究範圍由中原本部(China proper)拓展至今人習稱的內陸亞洲(Inner Asia)⁶，乃至於以歐亞大陸的整體視野來探究歷史時期中國與其他多元文明之間的交流，並且在民族史、宗教史、中外交流史與邊疆史地等諸領域上，取得了遠遠超過當時中國學界的成果。

面對西方語文學所帶來的新興挑戰，出身於乾嘉學術的羅振玉與王國維不僅沒有採取保守的抵制態度，反而開始鼓勵中國的年輕學者學習語文學以解讀多語種新史料。羅振玉在 1911-1919 年旅居日本京都期間，曾接觸到了當時沙俄在內蒙古額濟納旗境內所發現的黑水城文書，因此對西夏文獻產生興趣，而其子羅福成(1885-1960)、羅福萇(1896-1921)、羅福頤(1905-1981)等人也在這樣的因緣下開始學習並研究西夏文文書，成為近代中國最早掌握西夏文的一批學者。在西夏文之外，羅振玉又促成其子研究契丹、女真、蒙古與滿洲語文。羅振玉 1937 年在為《滿洲金石志》所作之序文中，便曾提及其於辛亥革命後旅居日本，得見內藤湖南所藏滿洲地區碑文拓本，從而促成其子羅福頤搜集

⁶ 西方學術界對於廣義概念上的「內陸亞洲」，迄今並沒有一個完全統一的規範，近年來比較具有影響力的學說如塞諾(Denis Sinor, 1916-2011)在《劍橋早期內亞史》中以「內陸亞洲」作為歐亞大陸定居農耕民族的對立概念，並強調其浮動性。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vol. 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8. 但需要注意的是，今日英文學界中所流行的「內陸亞洲」(Inner Asia)與後冷戰的背景息息相關。在十九至二十世紀初，國際學界較為通行的是法文的「高地亞洲」(La Haute Asie)，其次為德、俄文的「中央亞洲」(Zentralasien /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相關碑文並研究契丹文字的經過：

契丹國書，久絕於天壤，學者尤珍異，於是滿洲古刻石不僅入東方士夫之目，並騰於世界學者之口矣。予頻年以來搜求墨本，命兒子福頤編《滿洲金石志》，苦求備之不易。⁷

1922年6月羅振玉致王國維的信件中，又提及在整理內閣大庫時，發現大量滿、蒙文書籍，可惜當時缺乏能夠解讀的人才，羅振玉因此有意聘請蒙古文專家甚至計劃讓其子學習蒙古文：

庫籍中滿蒙文書為第一，惜無通其文者。前檢得《遼史》及《西遼史》、《元例》四冊外，頃又得《大元史書》一本，尚有類似者二三冊，異日入都，當聘一熟悉精蒙文者來從事移譯，並擬令兒輩受學。⁸

如同羅振玉一樣，王國維也十分重視當時敦煌文書與內閣大庫等新問世的內亞諸語文獻，甚至在1922年10月致信時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研究室主任馬衡(1881-1955)，建議在大學中設立滿、蒙、藏文講座，並派遣有歷史學基礎的研究生負笈法國、德國等地進修滿、蒙、藏文：

現在大學是否有滿、蒙、藏文講座？此在我國所不可不設者，其次則東方古國文字學並關緊要。研究生有願研究者，能資遣法德各國學之甚善，惟須擇史學有根柢者乃可耳。⁹

王國維的這封信件，其實已經反映出中國學術界未來的潮流；而當時負笈歐美各地，遍學梵、藏、蒙、滿文的陳寅恪，正可謂預其流者。1923

⁷ 羅福頤輯，《滿洲金石志》，收入《歷代碑誌叢書》，第23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據1937年滿日文化協會刊本影印)，頁1。

⁸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繼祖審訂，《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第723通，頁535。

⁹ 王國維，《王國維全集》，第1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頁808。

年，時在柏林大學求學的陳寅恪，曾在寄給其妹陳新午(1894-1981)的信件中，自述其戮力於藏、蒙、滿諸語文獻的治學心跡：

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續藏兩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續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類書百種而已。若不得之，則不能求學，我之久在外國，一半因外國圖書館藏有此項書籍，一歸中國，非但不能再研究，並將初著手之學亦棄之矣……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係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又蒙古滿洲回文書，我皆欲得。¹⁰

1923年的這段文字，體現出陳寅恪與羅振玉、王國維等前輩在重視發展滿、蒙、藏學一事上，可謂所見略同。而陳寅恪本人更是因留學海外之便，得以從名師學習梵、藏、蒙、滿文，因此在語文學方面，體會又更為深入。從這段文字中，亦可發掘陳寅恪早年治學的幾點感想。第一，當時中國的圖書情況，不僅難以取得藏漢文大藏經等研究材料，即便是各類字典與類書等研究工具亦屬難得。治東方語文學的研究者，往往需要閱讀大量滿、蒙、藏等多語種文獻，然而1920年代中國

¹⁰ 陳寅恪，《書信集》(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頁2。按：關於收件人為陳新午一事，見：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筼》(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頁42。此處所謂「西藏文正續藏」，指藏文甘珠爾(*Bka' 'gyur*)與丹珠爾(*Bstan 'gyur*)。又俞曲園，即晚清樸學家俞樾(1821-1907)，曾著《金剛經注》與《金剛經訂義》。

在這方面的研究資源，完全無法與歐美日俄等國相比，因此陳寅恪當時已認識到一旦返回中國，其在語文學方面的努力，必然將因為圖書條件的不足而功虧一簣。關於外在圖書條件對語文學研究內在發展的制約，1920年代寓居北京的梵藏語文學者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1877-1937)在校勘《大寶積經·迦葉品》(*Kāśyapaparivarta*)梵藏漢文本時亦有過相似的感慨：「在北京任何公立圖書館中甚至沒有一本梵文文法或辭典」，¹¹足見當時中國尚未具備從事語文學之充分圖書條件。第二，陳寅恪所關心的學科，實際上並不是作為「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的歷史語言學(historical linguistics)，而是通過語文學利用各種語言的史料，藉此深入研究歷史學與佛教文獻學。第三，陳寅恪特別強調非漢文獻對於開拓史源與考訂正誤的重要性，例如治唐史、吐蕃史與西夏史，則藏文為相當關鍵之研究工具；研究佛典除了漢譯本外，還須比對梵、藏文本以勘訂漢文本的訛誤；此外，陳寅恪雖然當時在歷史學方面關心唐代、吐蕃與西夏等課題，然而他對於蒙古文、滿文、察合臺文文獻亦有所留心，這也體現了其治學範圍的廣博。

三、華梵繙經雪上頭：陳寅恪與語文學在中國的傳習

陳寅恪早歲在海外治學，多留心於佛經翻譯與東方語文學。1919至1921年間，他曾在哈佛大學從梵文學蘭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 1850-1941)學習梵文及巴利文，並取得了相當優異的成績。1921至1925年間他曾在柏林大學隨路德施(Heinrich Lüders, 1869-1943)、繆勒(Friedrich Wilhelm Karl Müller, 1863-1930)、黑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等東方語文學

¹¹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The Kāśyapaparivarta: A Mahāyānasūtra of the Ratnakūṭa Class*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6), xiii. 此承匿名審查人提示，謹此致謝。

者學習梵文、回鶻文、蒙古文等語文。¹²根據目前學者所見陳寅恪留德時期的學習筆記，就數量上而言以藏文、梵文、突厥文、回鶻文以及蒙古文為大宗，¹³由此可見其早年對於內亞語文研究曾頗為用功，而這點亦體現在當時其他中國留德學生對陳寅恪的評價與觀察。如與陳寅恪曾為留德同學的李思純(1893-1960)，於 1923 年所作〈柏林留別陳寅恪〉中道出當時陳寅恪對佉盧字(Kharoṣṭhī)與梵文佛典的研究興趣：「佉盧結字珍聯璧，華梵繙經雪上頭。如我榛荆嘆荒落，多君鉛槧有清修。」¹⁴而 1924 年由北京大學公派留德的姚從吾(1894-1970)在與朱希祖(1879-1944)的信中稱陳寅恪「近專攻毗鄰中國各民族之語言，尤致力於西藏文。」¹⁵除了具體的語文學習外，陳寅恪在留學階段亦學習了西方的語文學方法，並進一步將其應用在中國史與佛教文獻研究中。如陳寅恪在 1929 年致傅斯年的信件中曾提及其校勘梵、藏、蒙、漢諸語佛經的治學方法：「蓋現在佛經之研究為比較校刊學，以藏文校梵文，而藏文有誤，更進一步以蒙文校之，又核以中文或稍參以中央亞細亞出土之零篇斷簡，始成為完全方法。」¹⁶而陳寅恪在返回中國後，

¹² 林偉，〈陳寅恪的哈佛經歷與研習印度語文學的緣起〉，《世界哲學》，2012：1(北京，2012.1)，頁 137-152；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中國近代人文學的東方學與西學背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 60-99；張國剛，〈陳寅恪留德時期柏林的漢學與印度學——關於陳寅恪先生治學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識〉，收入胡守為編，《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 210-219。

¹³ 季羨林，〈從學習筆記本看陳寅恪先生的治學範圍和途徑〉，收入季羨林，《季羨林文集》，第 6 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頁 272-285。

¹⁴ 李思純，〈柏林留別陳寅恪〉，《學衡》，22(南京，1923.10)，頁 88。

¹⁵ 姚士鰲，〈史學系派遣留德學生姚士鰲致朱邊先先生書〉，《北京大學日刊》，第 1465 號，1924 年 5 月 9 日，第 3 版。

¹⁶ 陳寅恪，〈陳寅恪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某年某月 24 日，元 4-6。陳寅

也曾經試圖將這一套強調比較多語種的語文學方法引入中國學界。

1926 年，陳寅恪返回中國並應聘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隨後亦在清華學校歷史學系以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兼任教職。¹⁷陳寅恪甫回中國時，曾開設一系列東方語文學相關課程，並計劃指導相關領域研究生。1925 年陳寅恪尚未正式入職前，《清華週刊》上便已刊登其於國學研究院計劃指導的學科範圍，其中列有四項：一為「年歷學(古代閏朔日月食之類)」；二為「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係者之研究(如唐蕃會盟碑之藏文，闕特勤碑之突厥文部分與中文比較之類)」；三為「摩尼教經典回紇文譯本之研究，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紇文及中央亞西亞諸文字譯本，與中文譯本比較研究)」；四為「蒙古滿洲之書籍及碑誌與歷史有關係者之研究」。¹⁸除了計劃指導研究生從事上述內亞語文相關研究外，陳寅恪於 1926 年正式入職後，亦分別以「西人之東方學目錄學」與「梵文(金剛經研究)」為主題，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開設兩門普通演講課程。¹⁹至 1928 年，又在清華國學研究院開設「梵文文法」與「唯識二十論校讀」。²⁰

除了清華國學研究院外，陳寅恪也曾同校歷史學系開設過內亞語文研究相關課程。如 1929 年陳寅恪曾在歷史系開設「唐代西北史料(取近年西北發見之史料與舊史互相解釋證明。用書：《舊唐書》、《蒙古源流》。

恪，《書信集》，1929 年某月 24 日，頁 23。

¹⁷ 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 1911-1929——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頁 353-356。

¹⁸ 清華學校研究院、清華週刊編輯部，〈學校新聞·研究院〉，《清華週刊》24：2(北京，1925.9)，頁 32-34。

¹⁹ 清華學校研究院、清華週刊編輯部，〈學校之部·研究院現狀〉，《清華週刊》，27：11(北京，1927.4)，頁 498。

²⁰ 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編輯部，〈校聞〉，《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 15 期，1928 年 11 月 30 日，第 1 版。

自撰問題研究論文。)」課程。1930年又開設「高僧傳之研究(本學程以近年中亞考古學、東方語言學所得之材料及研究結論與中國舊籍互相證明，藉供治中國中古文化史者之參考)」與「唐代西北石刻」。1932年復開設「蒙古史料之研究(本學程取東西文字中舊有之蒙古重要史料加以解說及批評。近年北平故宮博物院發見之滿蒙文書籍，其與蒙古史有關者亦討論及之)」等課程。²¹

在清華之外，陳寅恪也曾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兼任期間，為本科三年級以上有志於從事內亞語文研究的學生提供指導。根據1926年《北京大學日刊》，陳寅恪提出的指導題目有四：「長慶唐蕃會盟碑藏文之研究(此碑經中西學者研究，其著作亦均先後發表，然尚多討論之餘地，無漢字對照之藏文中，如吐蕃紀元年號等，尤為關係重要，尚未經中外學者之考證，今宜綜合前此研究成績，並以近年西域發見之吐蕃古文為參訂之助，庶幾讀此碑者，能得真確之解釋，而於治唐史及古代西北方音者，或有小補焉)」、「鳩摩羅什之研究(我國佛教翻譯事業最著者，什師與慈恩兩人而已。關於慈恩之著述日多，而研究什公者絕少，此亦學術界之憾事也。近者燉煌故籍，多載逸文，龜茲古語，漸能通讀，關係之材料既廣，考證之方法宜新，特標此題以備有志於中國文化學術史者之研究)」、「中國古代天文星歷諸問題之研究」、「搜集滿洲文學史材料」。²²除了為北京大學的學生開列具體的指導研究方向外，陳寅恪亦曾於1928至1929年前後在該校史學系開設「佛經翻譯文學」、「蒙古源流研究」、「南北朝高僧傳」等課程。²³由此可見，陳寅恪在返回中國初期，曾積極試圖在清華與北京大學等學府培養東方語文學的人才，教授範圍

²¹ 王應憲編校，《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317、321、328。

²²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北京大學日刊編輯處，〈研究所國學門通告〉，《北京大學日刊》，第1998號，1926年12月6日，第1-2版。

²³ 勞幹，〈憶陳寅恪先生〉，收入張杰、楊燕麗編，《追憶陳寅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92。北京大學日刊編輯處，〈史學系課程〉，《北京大學日刊》，第2237號，1929年9月23日，第3版。

從中世的梵、漢、藏、突厥諸語系的佛經與碑銘，到近世以降蒙古文、滿洲文文獻，可以說是涵蓋了當時國際主流東方語文學的新興領域。

綜觀二十世紀 20 至 30 年代間陳寅恪於清華以及北京大學所開設的講演課程以及指導主題，基本延續了他在留學時期主要的治學關懷，即重視比較多語種文獻的歐洲東方語文學傳統。例如陳寅恪之所以在清華國學研究院開設「西人之東方學目錄學」，主要與他自留學時期便十分重視當時海外東方學的研究動態。早在留德時期，陳寅恪便相當關注當時西方學界編輯的藏文文獻目錄，甚至曾打算譯為中文。對此姚從吾曾在 1924 年稱陳寅恪「欲依據西人最近編著之西藏文書目錄，從事翻譯，此實學術界之偉業。」²⁴至於「梵文(金剛經研究)」這門課程，顯然與 1923 年〈與妹書〉所云「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²⁵不無關係，其旨趣在教授如何利用語文學校勘多語種佛教文獻之方法。

陳寅恪雖曾試圖經由課程講演與研究指導，將當時西方學界的東方語文學方法以及學術成果，結合個人心得傳授給學生，然而實際的教學成效卻相對有限。²⁶關於陳寅恪講授梵文《金剛經》的情況，當年就讀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姜亮夫(1902-1995)回憶：「例如寅恪先生講《金剛經》，他用十幾種語言，用比較法來講，來看中國翻譯的《金剛經》中的話對不對……因此寅恪先生的課我最多聽懂三分之一(而且包括課後再找有關書來看弄懂的)，除此之外，我就不懂了。」²⁷而曾就讀北京大

²⁴ 姚士鰲，〈史學系派遣留德學生姚士鰲致朱邊先先生書〉，《北京大學日刊》，第 1465 號，1924 年 5 月 9 日，第 3 版。

²⁵ 陳寅恪，《書信集》，頁 2。

²⁶ 桑兵，《學術江湖——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頁 59。

²⁷ 姜亮夫，〈憶清華國學研究院〉，收入張杰、楊燕麗編，《追憶陳寅恪》，頁 70-71。

學史學系的勞榦(1907-2003)也曾憶及陳寅恪授課內容之難：「『佛經翻譯文學』這門課，因為同學中國沒有一個學過梵文的，最後只能得到一點求法翻經的常識，深一層了解沒有人達到。」²⁸關於學生因語言基礎不足而無法吸收陳寅恪授課內容一事，1934年時任清華大學文學院代理院長蔣廷黻(1895-1965)在《歷史學系近三年概況》一文中亦專門提及：「國史高級課程中，以陳寅恪教授所擔任者最重要。三年以前，陳教授在本系所授課程多向極專門者，如蒙古史料、唐代西北石刻等，因學生程度不足，頗難引進。近年繼續更改。」²⁹此後陳寅恪因而改授學生比較容易吸收之兩晉南北朝以及隋唐斷代史，而較少開設以內亞語文研究為核心的專題史。

在清華與北京大學的教學工作之外，1926至1936年間陳寅恪與鋼和泰的學術往來，亦曾對語文學在近代中國的傳習與發展，產生過一定的歷史影響。1926年陳寅恪應聘清華後，曾與當時寓居北京的鋼和泰曾共同校讀梵、漢、藏文等多語種佛教文獻。1928年陳寅恪致傅斯年書信稱：「鋼和泰已為美國哈佛大學聘定，不日即啟程赴美……弟年來居京，獲其教益不少(學問不博，然而甚精)。彼雖暫去，仍可再來，似亦無妨也。」³⁰陳寅恪之女陳流求也曾回憶他「回國後在北平清華任教時，堅持每週六進城到東郊民巷鋼和泰教授家裏，與他研討梵文和佛教典籍。」³¹鋼和泰在1935年致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葉理綏(Serge

28 勞榦，〈憶陳寅恪先生〉，收入張杰、楊燕麗編，《追憶陳寅恪》，頁92。

29 王應憲編校，《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下冊，頁744-745。

原檔無署年度，然根據其中提及「新任助教吳春暉擬以明史自任」等相關線索，可以推測為1934年所書。編者將其定為1929年，誤也。

30 陳寅恪，《書信集》，1935年5月4日，頁47-48。《書信集》編者推測此信書於1935年，然據陳懷宇考證應為1928年，此從後者，參：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頁102-105。

31 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也同歡樂也同愁》，頁100。

Elisséeff, 1889-1975)的英文信件中，也提到他本人和陳寅恪之間密切的學術往來：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訊來源是陳寅恪教授，我本人和哈佛燕京學社從來沒有給他薪酬，但他自 1926 年來定期參加我的梵藏漢個別指導班(每週 3-4 小時)，只有 1928-1929 年我在美國的那段時間例外。他被中國人視為目前在世最偉大的漢學家之一，在美國(哈佛)和歐洲學習的歲月裡非常嫻熟地掌握了西方的研究方法。³²

至於陳寅恪與鋼和泰具體共同合作解讀了哪些梵、藏、漢、蒙、滿文之多語種佛教文獻，可從兩人之著作與書信中略見一二。如陳寅恪曾在《柳如是別傳》中提到其曾與鋼和泰對讀《楞嚴經》(*Sūraṅgama Sūtra*)漢、藏、滿、蒙文諸語譯本，並試圖還原其中梵文咒語一事。³³此外，陳寅恪在〈論韓愈〉中也曾回憶道：「如馬鳴所撰佛所行讚，為梵文佛教文學中第一作品。寅恪昔年與鋼和泰君共讀此詩，取中文二譯本及藏文譯本比較研究，中譯似尚遜於藏譯，當時亦引為憾事，而無可如何者也。」³⁴由此可見兩人也曾共同對讀過馬鳴(*Aśvaghōṣa*)《佛所行讚》(*Buddhacarita*)梵、藏、漢文本。另外根據鋼和泰書信，還可以得知

³² “Staël-Holstein’s Annual Report of 1935,” dated on February 27, 1935,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Cf. Wang Qilong and Deng Xiaoyong, *Academic Knight between East & West: A Biography of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Asia, 2014), 20. Wang Qilong,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and His Sino-Indian Institute,” *China Tibetology* (English Version) 2014:1 (March 2014): 26. 王啟龍編著，《鋼和泰學術年譜簡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45。

³³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頁 179。

³⁴ 陳寅恪，〈論韓愈〉，收入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頁 331。

1930 至 1934 年間，陳寅恪曾與鋼和泰先後共讀過《法華經》(*Saddharma Puṇḍārika Sūtra*)以及《大寶積經·迦葉品》的梵、藏、漢文本，曾先後參與這個指導班的還有柏林大學教授雷興(Ferdinand Diedrich Lessing, 1882-1961)、猶太裔梵文學者李華德(Walter Liebenthal, 1886-1982)以及哈佛燕京學社留學生魏魯男(James Roland Ware, 1901-1977)、顧立雅(Herlee Glessner Creel, 1905-1994)等海外學人。³⁵從客觀條件上看來，陳寅恪在返回中國的前十年之所以能夠繼續從事東方語文學的研究，與鋼和泰主持之中印研究所(Sino-Indian Institute)提供的國際圖書資源以及海外學術網絡關係密切。而隨著 1937 年鋼和泰病逝以及中日戰爭爆發，這些有利於陳寅恪繼續從事語文學研究的外在條件，也終隨風而逝。

四、千年舊史與異國譯音：陳寅恪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除了在清華、北京大學以及中印研究所的教學與學術活動外，陳寅恪在推進東方語文學以及內亞文字研究的努力，更體現在其相關研究成果中。陳寅恪在語文學方面的學術貢獻，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1928 年 7 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同年 9 月 18 日中央研究院即聘請陳寅恪為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³⁶而陳寅恪的學術生涯也自此與史語所結下深厚的淵源。

³⁵ Wang Qilong and Deng Xiaoyong, *Academic Knight between East & West*, 19, 102-104; Wang Qilong,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and His Sino-Indian Institute," 26-27; 王啟龍編著，《鋼和泰學術年譜簡編》，頁 153-155、169、191-192、216。

³⁶ 「函達本院院長蔡元培先生聘先生為本研究所研究員，業承許諾，感荷無量。」見〈本所致函陳寅恪〉，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28 年 9 月 18 日，元 130-9a。大約在 1929 至 1930 年間，陳

根據〈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十七年度報告〉，陳寅恪初到史語所的任務，除了在北平組織史料學組，主要是研究清史並商購內閣大庫檔以及考訂《蒙古源流》與《藏文大藏經》等事。³⁷此外，陳寅恪也與時任助理員的于道泉(1901-1992)共同編輯藏文書目。³⁸由此可見，在史語所成立初期，陳寅恪主要集中精力研究滿、蒙、藏文等多語種史料。

陳寅恪在史語所工作初期，主要的學術研究可以說是圍繞著《蒙古源流》(*Qad-un ündüsün-ü erdeni-yin tobči*)一書展開的。³⁹1927年冬季，陳

寅恪由史語所支付薪水，此後薪資仍由清華大學支付，但仍保留史語所專任研究員名義，而實際上適用兼任待遇。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編，《傅斯年遺札》，第3卷(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頁1753。陳寅恪在1930年後由清華支領全新，而在史語所雖掛名第一組主任與專任研究員名義卻不支領中研院薪水一事，似乎與當時史語所第一組內的人事問題有關。當時陳寅恪因在清華專任，第一組的實際事務主要由徐中舒(1898-1991)負責，在1930年前後徐中舒曾因組內人事問題而有倦勤之感。陳寅恪為挽留徐中舒一事致書傅斯年時，曾謂：「鄙意惟弟不領史語所之薪，則第一組精神可改變，而不致有渙散畸形之現狀。」〈陳寅恪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某年某月15日，元4-21。陳寅恪，《書信集》，某年某月十五日，頁39。

³⁷ 傅斯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十七年度報告〉，收入傅斯年著，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6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頁13。

³⁸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十七年度報告〉：「藏文籍目錄，由本組主任陳寅恪約同助理員于道泉編纂」。傅斯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十七年度報告〉，收入傅斯年著，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6卷，頁17。按：于道泉，藏學家，被視為近代中國藏學的奠基者，曾於1928至1934年間於史語所擔任助理研究員。關於于道泉的詳細生平事蹟，可參：王堯編，《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³⁹ 此書蒙古文本為薩綱徹辰(*Sayang sečen*, 1604-?)於康熙元年(1662)寫就，並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由喀爾喀蒙古成袞扎布(?-1771)將抄本獻予清廷，隨

寅恪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發現《蒙古源流》蒙古文本及其滿文譯本，隨後將這些新發現的史料與《四庫全書》的漢譯本進行對勘。⁴⁰從其遺留下來的文稿來看，陳寅恪在研究《蒙古源流》時，頗為倚重歐洲學者的先行研究。如其在一本封面題為《蒙兀史料》的筆記中有整整四面篇幅列出《蒙古源流》的史源依據，並將這些蒙古文史料題名的拉丁字轉寫以及德、漢文翻譯依序羅列。⁴¹雖然這本筆記中並沒有提到參考資料的出處，但經比對轉寫系統與內容，可以推斷陳寅恪的這段筆記應是抄自荷裔蒙藏學巨擘施密德(Isaac Jacob Schmidt, 1779-1847)於1829年出版之《蒙古源流》德譯本，⁴²由此亦可管窺其對於歐洲東方學界先行研究的掌握。

根據上述材料，陳寅恪撰寫了一系列相關論文並在1930-1931年

後被譯為滿、漢文。乾隆三十一年成袞扎布之所以呈《蒙古源流》，主要是由於乾隆帝(1735-1796 在位)不明白為何《元史》稱蒙元皇室姓「奇渥溫」(kiyad)，而當時身為成吉思汗後裔的蒙古王公卻姓「博爾濟吉特」(borjiyid)，認為《元史》漢字對音有誤，所以令成袞扎布查詢喀爾喀地方關於成吉思汗之檔冊。關於乾隆《欽定元史語解》與《蒙古源流》蒙、滿文本之間的關係，以及滿文檔案所見相關史實，筆者將另文考釋，茲不贅述。

⁴⁰ 傅斯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十八年度報告〉，收入傅斯年著，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6卷，頁61。

⁴¹ 陳寅恪，《蒙兀史料》，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先生遺墨》(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5)，頁100-103。

⁴² Isaac Jacob Schmidt, *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 und ihres Fürstenhauses, verfasst von Ssanang Ssetsen Chungtaidschi der Ordos* (St. Petersburg: Gedruckt bei N. Gretsche, 1829), 11 & 299. 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攷〉在討論《蒙古源流》版本時，曾提及此書：「以予所見諸本，惟施密德氏 Issac Jacob Schmidt 之蒙文校譯本，二名分列，又未省略，實較成袞扎布本為佳。」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1(北平，1930.5)，頁2。

間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⁴³陳寅恪對《蒙古源流》用功至深，甚至曾在給羅家倫(1897-1969)的信中提及頗欲續王國維遺志，完成校注《蒙古源流》一事，為此甚至打算將其清華的教學工作暫停一年。⁴⁴在《蒙古源流》系列研究之外，1931-1932年間陳寅恪也陸續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了關於〈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經考釋序〉等內亞語文研究相關論文，⁴⁵至今仍具參考價值。

陳寅恪在史語所工作初期，可以說是其學術產出的高峰期，而所作文章又多與其早年在海外所精研的東方語文學有關。這個時期陳寅恪個人治學與史語所的整體發展之間，可以說是一種相互扶持的關係，史語所同仁之間的論學，對陳寅恪個人的研究與寫作可能曾發揮過一定的影響。在史語所早期的同事之中，與陳寅恪較為親近的當屬傅斯年，而陳寅恪早期關於內亞史及語文學的論著，在正式發表前多有與傅斯年相討論者。如1929年2月9日陳寅恪致書傅斯年，曾提

⁴³ 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攷〉，頁1-5；〈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北平，1930.6)，頁125-129；〈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北平，1931.4)，頁302-309；〈蒙古源流作者世系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北平，1931.4)，頁310-311。

⁴⁴ 〈陳寅恪致羅家倫等〉：「前函略言欲於一年內校注《蒙古源流》事，茲再詳陳之。《蒙古源流》著錄於《四庫書目》，然訛誤極多，幾不可讀。王觀堂先生臨卒前猶勤校此書，然迄未能蒞事。近日既得蒙古文原本，而中國文本系自滿文譯出，又於景陽宮發見滿文本，及蒙文書社新印漢文本，寶瑞臣、王靜安等校本，是治此書之一最好機會，故思以一年之期間為之。」羅久芳編，《五四飛鴻——羅家倫珍藏師友書簡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頁118-119。

⁴⁵ 陳寅恪，〈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北平，1931.4)，頁281-282；〈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經考釋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4(北平，1932)，頁404-405。

及：「弟近日草『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一文，即蒙古源流研究之一，俟寫正後再寄呈求教(因作此書校注至第二卷有與唐書相關者，引用拉薩唐蕃會盟碑之藏文以校正新舊唐書吐蕃傳等也)。」⁴⁶陳寅恪信中的這段文字，其實也反映出其經由內亞諸語文研究貫通唐代吐蕃史乃至清代蒙古史的治學心路。而研究蒙藏歷史乃至於內亞史整體，本不應受限於中原王朝的斷代區分，這或許也是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可為今人提供的一個重要參照。

傅斯年在讀過〈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一文後，對於陳寅恪的行文思路與治史方法大為激賞，以至於其在北京大學授課時所編纂之〈史學方法導論〉講稿中，曾將〈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全文收錄，並稱：

我的朋友陳寅恪先生，在漢學上的素養不下錢曉微，更能通習西方古今語言若干種，尤精梵藏經典。近著〈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一文，以長慶唐蕃會盟碑為根據，『千年舊史之誤書，異國譯音之訛讀，皆賴以訂』。此種異國古文之史料至不多，而能使用此項史料者更屬至少，苟其有之，誠學術中之快事也。⁴⁷

此外，在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一文正式出版前，⁴⁸曾就隋唐時期關隴集團的內亞因素與傅斯年進行過學術討論，傅斯年並在 1931 年 10 月間致書陳寅恪，不僅曾高度讚揚其發現並提供相關補充意見：

46 〈陳寅恪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某年 2 月 9 日，元 4-3。陳寅恪，《書信集》，1929 年 2 月 9 日，頁 25。

47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收入傅斯年著，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 2 卷，頁 321。按：錢曉微即清儒錢大昕(1728-1804)。又此處傅斯年引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中語，然陳文原作「皆賴以訂正」。

48 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1(北平，1931.8)，頁 39-48。

「上月圖書館開會後承兄于大街上告以近中發見楊隋、李唐帝室之非漢姓，倘佯通衢，為之大快。弟自國難起後，心緒如焚，月餘之中僅聞此事為之快意耳。」⁴⁹從這封信中可以得知，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一個多月，傅斯年對於時局感到十分焦慮，唯獨在與陳寅恪的論學過程中感到愉快，這也側面反映出當時史語所內同仁之間的良好學誼與論學氣氛。

陳寅恪在史語所期間之所以能生產高水準的學術成果，與史語所良好的圖書與行政資源不無關係。如陳寅恪在撰寫〈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一文的過程中，曾獲得當時史語所職員楊樾亭(1901-?)協助查詢圖書。1930年3月3日陳寅恪給楊樾亭的信中提及：「弟欲檢大谷學報寺本婉雅之『唐蕃會盟碑譯文』，請費神查出在何冊，並遣人送下。」⁵⁰除此之外，陳寅恪在1933年楊樾亭離開史語所前，曾通過其為所裡購置許多十九世紀以降德、法、日文的蒙藏學書籍，⁵¹這無疑為陳寅恪撰寫《蒙古源流》系列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圖書資源。另一

⁴⁹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編，《傅斯年遺札》，第1卷，頁378。按：此處所云「國難」，指1931年爆發之九一八事變。

⁵⁰ 劉經富，〈陳寅恪未刊信劄整理箋釋〉，《文史》，2012：2(北京，2012.5)，頁230。按：寺本婉雅(1872-1940)，日本京都東本願寺僧侶，1899年從康區進入西藏，1904年抵達拉薩，期間曾對西藏文獻有過深入調查。1915年出任大谷大學教授。此處陳寅恪提及之「唐蕃會盟碑譯文」，見：寺本婉雅譯註，〈唐蕃會盟碑文〉，《大谷學報》，10：3(京都，1929.9)，頁101-139。1911年內藤湖南得到《長慶二年唐蕃會盟碑文》拓本，由當時在京都大學教授藏文的寺本婉雅將其譯為漢文，其原委參：內藤虎次郎，〈拉薩の唐蕃會盟碑〉，收入內藤虎次郎，《研幾小錄——一名支那學叢考》(東京：弘文堂，1928)，頁301-342。又內藤湖南當年所獲《長慶二年唐蕃會盟碑文》拓本原件，今藏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編號：TOU1502X-TOU1506X。

⁵¹ 劉經富，〈陳寅恪未刊信劄整理箋釋〉，頁229-255。

方面，由於陳寅恪的閱讀需求，史語所也得以購買、擴充東方語文學相關的外文書籍。1933年楊樾亭離職後，陳寅恪購買西文書則主要經由史語所圖書員趙邦彥(?-1960)協助。如1933年12月，陳寅恪曾託傅斯年囑咐趙邦彥購買西文「吐火羅文法」以及哈佛大學梵文教授蘭曼的榮休紀念文集，並由趙邦彥將書籍寄送至清華給陳寅恪。⁵²陳寅恪所建議購買的外文書籍，多為當時國際東方語文學界之一流著作，這對於史語所的圖書購置應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尤其在時任圖書員的趙邦彥自承「對西文程度甚淺，英文、法文尚能勉強了解一二，德文則一無所知」⁵³的情況下，陳寅恪的閱讀書單可說是為史語所圖書館提供了當時海外學術的前沿情報。

除了外文二手文獻的建購外，陳寅恪對史語所整理一手史料的弘大計畫更是有著關鍵的影響。史語所成立至今逾九十年，內閣大庫檔案的取得、保存、整理與刊布無疑為世界學林所稱道，前人對於史語所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經過亦有詳述。⁵⁴本文在此主要利用《傅斯年

⁵² 〈趙邦彥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34年3月21日，元102-9。按：信中提及「吐火羅文法」一書，應為1931年德國吐火羅文學者西克(Emil Sieg, 1866-1951)與西克林(Wilhelm Siegling, 1880-1946)等人出版之名著《吐火羅文語法》(*Tocharische Grammatik*)。Emil Sieg, Wilhelm Siegling, and Wilhelm Schulze, *Tocharische Grammatik, im auftrag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31)。又陳寅恪於1919-1921年在哈佛大學曾隨蘭曼習梵文，其榮休文集參：Antoine Meillet et al., *Indian Studies in Honor of Charles Rockwell Lanm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⁵³ 〈趙邦彥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34年3月21日，元102-9。

⁵⁴ 關於史語所內閣大庫的整理經過，可參考：劉錚雲，〈舊檔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現況〉，《新史學》，9：3(臺北，1998.9)，頁135-162。李慧敏，〈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緣起〉，《檔案季刊》，8：2(臺北，2009.6)，頁46-55。

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中的相關信件，進一步勾勒陳寅恪在史語所整理內閣大庫檔案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如前文所述，據傅斯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十七年度報告〉中稱，陳寅恪在 1928 年進入史語所的首要任務便是「擬先利用在北平可得之史料，整理清代史中數重要問題……又明清內閣大庫檔案落在私人手者，亦於此時開始接洽購回。」⁵⁵1928 年 10 月 17 日，陳寅恪便曾致書促請傅斯年商購李盛鐸(1859-1937)藏內閣大庫檔案，並在信中高度評價了內閣大庫檔案的史料價值：「弟以為此物如落入燕京之手，殊不佳妙，且聞有八千麻袋之多，將來整理明清史料必不可少之資料。」⁵⁶1928 年底陳寅恪更是數度通過自己在士林的人脈，與馬衡一起向李盛鐸議價，約定以 2 萬元將李盛鐸原本索價 3 萬元的內閣大庫檔案購入所中。⁵⁷陳寅恪之所以如此為史語所商購內閣大庫檔一事費心奔走，甚至向傅斯年直言「弟以為此物如落入燕京之手，殊不佳妙」，與其國族認同不無關聯。

1929 年初，陳寅恪雖代表史語所向李盛鐸約定以 2 萬元購買內閣大庫檔案，然而當時中央研究院的財務情況，僅能允許支付 1 萬元，這使得陳寅恪感到非常焦慮，其致書傅斯年稱：「現燕京與哈佛之中國學院經費頗充裕，若此項檔案歸於一外國教會之手，國史之責託於

⁵⁵ 傅斯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十七年度報告〉，收入傅斯年著，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 6 卷，頁 13。

⁵⁶ 〈陳寅恪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28 年 10 月 17 日，元 4-1。陳寅恪，《書信集》，1928 年 10 月某日，頁 19-20。按：根據此信原件，《書信集》整理者遺漏結尾日期「十七日下午七時」。

⁵⁷ 〈陳寅恪致函蔡元培、楊銓、傅斯年〉，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28 年 12 月 27 日，元 308-6。

洋人，以舊式感情言之，國之恥也。」⁵⁸在同年另一封寄予傅斯年的信中，陳寅恪提及他為了履行中央研究院所約定的職務而拒絕了哈佛大學邀請：「弟接到哈佛聘書，囑授華梵比較之學，弟以與中央研究院有著書之約辭之矣。聞胡適之先生亦被邀，聞亦不去，不知確否？」⁵⁹從這兩封信件中，不難看出陳寅恪的國族認同曾對其在史語所的學術及工作經歷產生過一定的影響，而這也呼應了當時傅斯年「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⁶⁰的精神號召。

在檔案的整理與保存外，陳寅恪又促請傅斯年儘快將整理好的內閣大庫檔案拍照出版。陳寅恪在 1930 年前後曾向傅斯年建議：

所中整理檔案所得之實錄，由今各方面關於清初史料發現之情形言之，可推定為第一等重要材料，似不可不急發表。近見羽田所印永樂大典站赤門實只用照像石印，所費不多……至考證一節，一時殊未易著手（史料未備，如《朝鮮實錄》等等皆不能見），故暫且先將其刊印，且可供給於東洋史學界，而表現史語所成績也。⁶¹

這封信件顯示出陳寅恪曾經參考羽田亨 1930 年出版的《元朝驛傳雜

⁵⁸ 陳寅恪，〈陳寅恪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某年某月 2 日，元 4-5。陳寅恪，《書信集》，1929 年某月 2 日，頁 24。

⁵⁹ 陳寅恪，〈陳寅恪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某年某月 24 日，元 4-6。陳寅恪，《書信集》，1929 年某月 24 日，頁 24。

⁶⁰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廣州，1928.10），頁 10。

⁶¹ 陳寅恪，〈陳寅恪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無年月日，元 4-19。陳寅恪，《書信集》，1929 年，頁 36。

考》⁶²翻拍出版《永樂大典》的技術，建議史語所比照類似的方式照相出版內閣大庫檔中所發現的《清實錄》原始稿本，如此不僅有助於新史料的刊布流通，亦有向日本東洋史學界爭鋒的意味。

陳寅恪在盡力為史語所爭取內閣大庫檔案的同時，亦極力爭取史語所保全、研究中國境內新發現之西夏文、蒙古文、藏文、滿文等多語種史料，以避免其流落海外。如 1928 年 12 月 27 日，陳寅恪致書時任中研院院長蔡元培(1868-1940)、中研院總幹事楊銓(1893-1933)與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三人，函稱：

朱遜先[希祖]先生言寧夏近出古籍數十箱，欲賣予外人，據云係西夏文，現已由張溥泉先生與徐永昌君商議，禁其賣與外人，一面調查此項古籍內容。如係西夏文，中央研究院似可購買，因西夏文材料幾全為俄人所專有，若吾國得此大宗資料，將來必有發明。⁶³

又 1929 年間，陳寅恪通過于道泉得知有人持蒙古文佛經向旅居中國的德國人兜售，建議傅斯年可以搶先收購：

頃于君道泉來云，在德人處見有持賣蒙文書一部，乃乾隆時續藏時之一冊，此書今所知者，只庫倫一部。然此書在北京印行(今絕不見蹤跡)，誠世界之環寶也。但賣此類書人，只願賣與外人，最怕中國人知。⁶⁴

⁶² 羽田亨，《元朝駢傳雜考》(東京：東洋文庫，1930)。

⁶³ 〈陳寅恪致函蔡元培、楊銓、傅斯年〉，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28 年 12 月 27 日，元 308-6。按：朱希祖，時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溥泉，即張繼(1882-1947)，時任司法院副院長。徐永昌(1887-1959)，時任綏遠省政府主席。

⁶⁴ 〈陳寅恪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某年某月 24 日，元 4-6。陳寅恪，《書信集》，1929 年某月 24 日，頁 23。按：陳寅恪分別將《甘珠爾》、《丹珠爾》慣稱為「正藏」與「續藏」，

陳寅恪此處所提到的「蒙文書一部，乃乾隆時續藏時之一冊」，指的應該就是乾隆六年至十四間(1741-1749)所刊刻的蒙古文《大藏經·丹珠爾》(*Danjuur*)部的其中一冊。1929年陳寅恪雖向傅斯年提及有人在中國向外人兜售蒙古文《丹珠爾》一事，並希望史語所能將其購得，然而這部書最後下落不明，此事亦無疾而終。

根據筆者考察，陳寅恪在1929年所關注的那套蒙古文《丹珠爾》，極有可能在同年被運往日本，而這套書之所以流落東瀛，和羽田亨有著密切的關係。在今日京都大學羽田紀念館內，藏有48函蒙古文佛經，因歷史因素未著入圖書館目錄。據筆者認看，為蒙古文《丹珠爾》之部分經卷。關於現存京都大學的蒙古文《丹珠爾》，其來歷可以在1929年的日文史料中找到線索。1929年10月12日《大阪每日新聞》中，曾刊載了一篇題為〈舉世珍貴的蒙古文丹珠爾——京大文學部近獲西藏、蒙古之經文〉的報導。這份報導採訪了時任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教授的羽田亨，並引用了羽田氏當時對這部蒙古文《丹珠爾》入藏京都大學的原委介紹：

自去年來頗費苦心，終於得到此份蒙古文甘珠爾之寫本與丹珠爾刻本，由於某氏的好意，提供予我大學，對此喜不自禁。私忖西洋的大學或圖書館中，亦有二、三處備有蒙古文甘珠爾，然而並無有丹珠爾者。尤有甚者，亦有人以為所謂蒙古文丹珠爾為不存在之物。無論西藏佛教或蒙古佛教的相關研究，至今全為西洋人所獨佔，我國中幾無染指之人，竊思因我國全無該研究資料之故也。倘有研究之資料，相信必將有所斬獲。我未來將把這些資料委付予學生，陸續將此相關的重要研究不斷發表呈覽。⁶⁵

在1923年陳寅恪著〈與妹書〉中亦可見到同樣的例子。陳寅恪，《書信集》，頁2。

⁶⁵ 羽田亨口述、大阪每日新聞社採訪，〈世にも珍し蒙古語のタンジュール

在羽田亨獲得了蒙古文《丹珠爾》刻本後，日本蒙藏學者石濱純太郎(1888-1968)隨即在 1931 年為文對這部蒙古文《丹珠爾》進行更深入的介紹。⁶⁶筆者認為，羽田亨在 1929 年所得到的蒙古文《丹珠爾》，極有可能正是陳寅恪在 1929 年致函傅斯年建議史語所搜羅的那部蒙古文《丹珠爾》。而陳寅恪之所以得知「此書今所知者，只庫倫一部」，應該是根據 1924 年伯希和在《通報》(*T'oung Pao*)上關於蒙古文《丹珠爾》的介紹：「蒙古科學委員會在一距離張家口(Kalgan)不遠的蒙古王公處，發現了一份保存良好的蒙古文印刷本《丹珠爾》，蒙古政府希望能儘快將這份抄本運至庫倫(Urga)。」⁶⁷陳寅恪當時已指出這些盜賣稀有古籍的販子「只願賣與外人，最怕中國人知」，而這部珍貴的蒙古文《丹珠爾》雖未被德國人買去，但亦落入日本人手中，最終塵封於京都大學羽田紀念館，隨著時代推移而為世人所淡忘。

值得注意的是，陳寅恪在建議購買蒙古文《丹珠爾》的同時，又極力向傅斯年推薦精通蒙藏語文的于道泉，陳寅恪稱：「于君甚精藏語，又兼治蒙文，實不可多得之人才。現在北海圖書館，月僅三十元，甚不敷用；前年弟每月借錢與之，他時歷史語言北平分所中，似不可不用，此人斷不至為羊公不舞之鶴，請放心用。」⁶⁸陳寅恪在同

——今度京大文學部についた西藏蒙古の經文》，《大阪毎日新聞》，1929 年 10 月 12 日，第 4 版。

⁶⁶ 石濱純太郎，〈京都帝國大學所藏蒙文丹珠爾記〉，收入桑原博士還曆記念祝賀會編，《東洋史論叢——桑原博士還曆記念》（東京：弘文堂書房，1931），頁 469-476。

⁶⁷ Paul Pelliot, "Chronique," *T'oung Pao* 23:4 (October 1924): 284-285.

⁶⁸ 〈陳寅恪致函傅斯年〉，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某年某月 24 日，元 4-6。陳寅恪，《書信集》，1929 年某月 24 日，頁 23。《書信集》錄文作「他時歷史語言所北平分所中似可以用」，與原檔不符，此據匿名審查人提示，謹此致謝。

年3月1日的另一封信件中，又再次向傅斯年舉薦于道泉稱：「彼現與嘛刺⁶⁹往來至繁，於蒙藏音韻語言之學，極有興趣，必可造之材。」⁷⁰由於于道泉通曉蒙藏語文的專長，陳寅恪對其非常提攜，兩人在1929年9月時除了已經編妥「西藏之著作者人名及書名目錄」外，⁷¹並有合作釐定西藏古今地名的計畫。⁷²陳寅恪甚至曾同于道泉前往故宮查看《滿文老檔》，因當時缺乏研究基礎，尚不能解讀老滿文，因此陳寅恪建請傅斯年令于道泉以史語所名義前往故宮調查，以進一步比對無圈點老滿文與帶圈點新滿文的差同。⁷³由此可見，陳寅恪在初到史語所時，除了《大藏經》、《蒙古源流》與《彰所知論》等蒙藏文獻外，又曾極力關心《內閣大庫檔》與《滿文老檔》等清代檔案的研究工作，並且力薦于道泉等通曉滿、蒙、藏文的青年學者加入史語所，進而與青年學人展開學術合作。

除了陳寅恪對蒙藏學人才的提攜外，史語所當時也為于道泉等蒙藏學青年學人提供了極佳的研究平臺。例如1930年于道泉曾以史語所的名義行文蒙藏委員會，希望能商借雍和宮、嵩祝寺與普度寺等處

⁶⁹ 原文如此，應為「刺嘛」(bla ma)之誤。

⁷⁰ 陳寅恪，《書信集》，1929年3月1日，頁27。

⁷¹ 這部目錄雖曾列入史語所單刊甲種之二，原題為《西藏文籍目錄》，最終本書似乎因故並無出版。歐陽哲生，《傅斯年一生志業研究》（臺北：秀威資訊，2014），頁184。陳寅恪曾在1930年前後致書傅斯年討論本書的正式題名，見：〈陳寅恪致函傅斯年〉，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某年某月16日，元357-19。

⁷² 〈陳寅恪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29年9月10日，元4-18。陳寅恪，《書信集》，1929年9月10日，頁34-35。

⁷³ 〈陳寅恪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無年月，元4-19。陳寅恪，《書信集》，1929年，頁35-36。

的蒙藏文佛經，⁷⁴雖然最終蒙藏委員會並沒有同意，⁷⁵卻也反映出史語所的地位曾為當時的青年學人提供了堅強的行政支持。史語所甚至在于道泉的建議之下，在 1933 年以前曾禮聘蒙古族的包南結(Borjigin Namjal)喇嘛作為蒙藏文獻顧問。⁷⁶1933 年于道泉在傅斯年的敦促之下，準備動身前往巴黎進修藏學，于道泉臨行前傅斯年曾與之商談為史語所儲備蒙藏研究人才一事。于道泉在 1933 年 6 月 19 日寫給傅斯年的信中，曾專門就史語所培養蒙藏學人才提出過相關建議，並向傅斯年推薦曾協助其編纂藏漢辭典的李永年(?-1980)⁷⁷：

前所談之物色蒙藏文研究生事，泉對此事曾費幾許心思，謹將所見約略述之：按我理想中的研究生，應當具有下列三個條件：(一)年輕而有語言學天才，將來有成蒙藏文字及語言學

⁷⁴ 〈本所致函蒙藏委員會駐平辦事處〉，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30 年 6 月 12 日，元 221-1。按：這份公文並沒有署上于道泉的個人姓名，但根據筆者比對字跡，可以確定書寫者為于道泉無疑。嵩祝寺，建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為二世章嘉呼圖克圖阿旺羅桑卻丹(Lcang skya ngag dbang blo bzang chos ldan, 1642-1714)在京駐錫之所，址在今北京市東城區。普度寺，原為多爾袞王府北部，康熙三十三年(1694)改建為清朝皇家寺院，供奉主尊大黑天，故稱瑪哈噶喇廟。乾隆四十一年(1776)賜名普度寺。地近紫禁城東華門，在今北京市東城區。

⁷⁵ 〈蒙藏委員會駐平辦事處致函本所〉，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30 年 6 月 12 日，元 221-2。

⁷⁶ 〈于道泉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33 年 7 月 10 日，元 62-11。

⁷⁷ 此人精研藏語文，並與于道泉友好。于道泉返回中國後曾經在 1950 年參加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藏語廣播組的宣傳工作，並曾推薦李永年參與。李永年留下的學術著作不多，較為人所知的是其曾先後耗費三十年漢譯藏文《四部醫典》(*Bdud rtsi snying po yan lag brgyad pa gsang ba man ngag gi rgyud*)，這是第一部漢文全譯本的《四部醫典》。字妥·元丹貢布(G.yu thog yon tan mgon po)等著，李永年譯，謝佐校，《四部醫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3)。

專家之希望者；(二)對蒙藏語文有深切之興趣者；(三)於蒙藏語

文及漢文俱有相當之研究，能利用包南結喇嘛之所學者。⁷⁸

除了蒙藏學青年人才的培育外，史語所在 1930 年前後亦積極試圖擴充蒙藏文工具書。除了陳寅恪與于道泉共同編纂的《西藏文籍目錄》之外，史語所在 1931 年也曾經委託北平永華印刷局印刷《蒙文字典》。⁷⁹以上對於青年學者的培養以及新史料與工具的搜羅，在在體現出史語所早期為發展東方語文學以及內亞文字研究的積極付出。

五、國亡有期而汗青無日矣：中日戰爭的爆發和語文學希望的破滅

前文提及陳寅恪與史語所之間，曾經專門就語文學推動了許多重大的學術工作。然而何以在回到中國十餘年內，陳寅恪便幾乎完全放棄早年曾嘔心瀝血的語文學研究？最主要的原因應為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陳寅恪在戰時路途中重要圖書及早年手稿嚴重散佚。

早在 1923 年〈與妹書〉中，陳寅恪就曾直言中國當時的圖書環境

⁷⁸ 〈薦李永年并告船票接洽情形〉，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33 年 6 月 19 日，元 62-9。

⁷⁹ 〈永華印刷局致函本所〉，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31 年 12 月 4 日，元 325-2。〈永華印刷局立據〉，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31 年 12 月 5 日，元 325-1。按：史語所在 1931 年印刷之《蒙文字典》，即波蘭裔東方學家科瓦列夫斯基 (Joseph Étienne Kowalewski, 1801-1878) 於 1844 至 1849 年間編著之《蒙俄法辭典》(*Dictionnaire mongol-russe-français*) 三冊之複印件，史語所檔案中曾保存本書第 1 冊頁 340 的複印樣張，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元 325-6。Joseph Étienne Kowalewski, *Dictionnaire mongol-russe-français*, vol. 1 (Kasan: Impr. de l'Université, 1844-1849), 340.

落後，很難提供研究東方語文學所需要的多語種文獻。⁸⁰而在 1926 年返回中國後，由於清華與史語所提供的外文書籍以及相關資源，使得陳寅恪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持續了解國際東方學界的動向。然而在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時局動盪，陳寅恪所能利用的圖書條件受到很大的限制。1938 年間，陳寅恪隨清華大學教員編入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曾多次從雲南蒙自寫信給在昆明史語所的勞榦與陳述(1911-1992)，委託兩人代為借書。如 1938 年 5 月 15 日，陳寅恪因在西南聯大教授「佛經翻譯」課程，手邊卻無《大藏經》可用，因此曾致書勞榦與陳述等史語所同僚求助。⁸¹1938 年 6 月 17 日，陳寅恪在與勞榦和陳述的信件中，再次痛陳無書可看以及時局破敗之苦：

聯大以書籍運費係其所付，不欲將書提出。現尚未開箱，故聯大無書可看……研究所無書，實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兩篇，竟無書可查，可稱「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謂國亡有期而汗青無日矣。大局如斯，悲憤之至。⁸²

不僅如此，陳寅恪早年收集的重要語文學藏書與筆記，也在戰亂流離之中丟失。1938 年 4 月，陳寅恪南渡後因考量妻子多病，將家人安置在香港，自行動身走海路經越南海防，乘滇越鐵路前往雲南蒙自赴任，未料中途最重要的圖書兩箱遭人調換。⁸³陳寅恪為此曾致書傅斯年云：「弟五箱運到而錯了兩箱。此兩箱中，恰置弟之稿件，雖又託人查問，此次恐是石沈大海矣。得而復失，空歡喜一場，反增懊惱。將來或可以藉口說：我本有如何如何之好文章，皆遺失不傳，亦是一藏拙作偽

80 「我之久在外國，一半因外國圖書館藏有此項書籍，一歸中國，非但不能再研究，並將初著手之學亦棄之矣。」陳寅恪，《書信集》，頁 2。

81 陳寅恪，《書信集》，1938 年 5 月 15 日，頁 206。

82 陳寅恪，《書信集》，1938 年 6 月 17 日，頁 208。

83 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也同歡樂也同愁》，頁 144。

之法耶！此殆天意也。」⁸⁴陳寅恪對這兩箱稿件與札記的丟失頗為痛苦，亦曾專門委託俞大綱(1908-1977)去訪查此事，然而終究不果。⁸⁵

陳寅恪所丟失的兩箱手稿與讀書札記，內容多有其早年治語文學之珍貴心得。1942年9月23日陳寅恪曾致書時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劉永濟(1887-1966)，曾再次提及在越南遺失書稿一事：

弟廿年所擬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遺失。中有蒙古源流注，係依據其蒙滿文諸本，并參稽其所出之西藏原書四庫提要所謂咖喇卜經等者，考訂其得失。與沈乙庵書大異。後聞伯希和在庫倫獲元秘史元本，故欲俟其刊佈，再有所增刪。用力雖勤而原書價值頗不高，今稿既已失去，亦不復談論此事矣……又凡佛教經典之存於梵文者，與藏譯及中譯合校，凡譯匠之得失，元本之為何，列於校記。今雖失去，將來必有為之者……所餘者僅不經意之石印舊唐書及通典二種，置於別筐，故幸存。於書眉之上，略有批注。⁸⁶

這封信件主要有兩點重要之處。一是反映出陳寅恪早年治《蒙古源流》的方法。他不僅比對《蒙古源流》的蒙、滿文版本，甚至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提到的藏文史料線索，進一步去探求所謂的「咖喇卜經」。實際上，陳寅恪所謂的「咖喇卜經」，即藏文 *rgyal rabs*(王統世系)之對音。*rgyal rabs* 為藏文文獻中的一種史書體裁，主要以歷代王

⁸⁴ 陳寅恪，《書信集》，1939年7月12日，頁59。

⁸⁵ 陳寅恪，《書信集》，1939年7月26日，頁60。

⁸⁶ 陳寅恪，《書信集》，1942年9月23日，頁244-245。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蒙古源流》「次紀土伯特汗世系始，始於尼雅特贊博汗，在善布山為眾所立，終於劉實德汗，大致亦頗與西番《嘉喇卜經》合。」永瑤等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據萬有文庫本排印)，卷51，頁1139。沈乙庵即沈曾植(1850-1922)，著有《蒙古源流箋證》。

統為經，旁及相關史事。歷代藏文史籍冠以 *rgyal rabs* 之名者甚多，著名者如成書於十四世紀後期之《王統世系明鑒》(*Rgyal rabs gsal ba'i me long*)等。據筆者考察，陳寅恪當年校注《蒙古源流》所使用的藏文「嘉喇卜經」，即是德國藏學家施拉君特懷特(Emil Schlagintweit, 1835-1904)所刊布並德譯的《拉達克王統史》(*La dwags rgyal rabs*)，⁸⁷這又再次體現其對當時海外東方學界研究成果的掌握。

更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在越南遺失書籍一事，嚴重地影響了陳寅恪學術生命的發展。陳寅恪早年對《蒙古源流》與梵、巴利、藏、漢文多語佛教文獻用功最深，然而當1938年其手稿盡失，因此不得不放棄早年關注的語文學。陳寅恪的子女事後回憶，這兩箱圖書之所以被盜，極可能是因為「他把批註最多最為重要的書籍，用最好的箱子裝載，沒想到這樣更容易引起竊賊覬覦，以致於兩箱書籍在轉運途中全被調包，易以磚塊。」⁸⁸陳寅恪當時手邊僅存的圖書，僅有「不經意之石印舊唐書及通典二種」，與其辛勤注釋的《蒙古源流》相比，《舊唐書》和《通典》不過是「略有批注」。由此或可見陳寅恪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前，對於《蒙古源流》及梵藏佛典的關注，遠較唐史

⁸⁷ Emil Schlagintweit, *Die Könige von Tibet: von der Entstehung königlicher Macht in Yárlung bis zum Erlöschen in Ladák* (München: Verlag der k. Akademie, 1866). 陳寅恪在〈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攷〉中，曾經引用施拉君特懷特此書刊行之藏文部分頁12之內容。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攷〉，頁2。實際上，《拉達克王統史》並非《蒙古源流》的直接史原，而清代四庫館臣所謂的「西番《嘉喇卜經》」亦另有其書，陳寅恪當時可能是因當時所能搜集的藏文材料稀少，故用此書證《蒙古源流》。由於藏文史料中的王統世系一類史籍經常有互相傳抄的現象，當其發現《拉達克王統史》與《蒙古源流》有部分重合，隨即認定施拉君特懷特所整理的《拉達克王統史》與清人所謂「西番《嘉喇卜經》」為同一書，或可再議。

⁸⁸ 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也同歡樂也同愁》，頁265。

官書為多；而陳寅恪「略有批注」的《舊唐書》和《通典》由於沒有被放置在最為要緊的兩個書箱內，因此得以倖存。由此可見，1938年後陳寅恪遺失重要手稿後，治學重心由內亞語文研究與佛教文獻學徹底轉入唐史研究，可能主要與1930年代中國的圖書收藏條件有關，而中日戰爭時期的動亂影響尤鉅，似乎並不完全是其治學內在理路的自然轉變。

1938年手稿丟失後，陳寅恪屢屢自稱不敢再過問內亞史及語文學，這似乎也反映其對兩者的介懷與不捨。1942年陳寅恪為陳述《遼史補注》作序時自稱：「頻歲衰病，於塞外之史，殊族之文，久不敢有所論述。」⁸⁹1943年為朱延豐(1906-1969)《突厥通考》寫序時又自承：「寅恪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後。年來自審所知，實限於禹域以內，故僅守老氏損之又損之義，捐棄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復敢上下議論於其間。」⁹⁰1943年陳寅恪致書方豪(1910-1980)時又謂：「弟於蒙古史事，今不敢妄談矣。」⁹¹自1938年《蒙古源流》與梵藏佛經相關的札記與手稿丟失後，陳寅恪對於自己「捐棄故技」一事再三感慨，同時也向陳述與朱延豐等從事內亞史の後學表達勉勵之意，希望他們能夠在契丹、突厥史方面後來居上，完成前人無法完成的事業。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陳述的《遼史補注》與朱延豐的《突厥通考》等優秀的內亞史著作，最終都因時局艱困而沒能在二十世紀順利出版，自然也就未能對學界產生廣泛的影響。陳述自1930年代開始撰寫《遼史補注》，經歷各種波折，終於在1992年完成十冊巨作後辭

89 陳寅恪，〈陳述遼史補注序〉，收入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頁162。

90 陳寅恪，〈朱延豐突厥通考序〉，收入陳寅恪，《寒柳堂集》（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頁162。

91 陳寅恪，《書信集》，1943年1月6日，頁248。

世，而這本遼史研究的豐碑直到 2018 年才由中華書局出版。⁹²至於 1949 年後曾在臺灣東海大學歷史學系任教的朱延豐，其《突厥通考》及相關論文迄今未見出版，手稿僅曾為個別治突厥史的學者引用，如今下落不明。⁹³

除了中日戰爭期間圖書條件的匱乏與個人手稿的丟失，陳寅恪早年為內亞史及語文學界所留下的遺產之所以沒能發揮更進一步的影響，尚有其他外緣因素。例如陳寅恪在清華與北京大學任教期間，教授「西人之東方學目錄學」、「梵文(金剛經研究)」、「佛經翻譯文學」、「蒙古源流研究」等課程時，往往旁徵博引各種東西方語文，聽課學生多半沒有相關語言基礎，無法吸收授課內容，因此教學並未收到良好的成效。

除此之外，陳寅恪當年曾向傅斯年極力推薦並視為「必可造之材」的于道泉，最終也與史語所分道揚鑣，對於史語所當年發展東方語文學與內亞文字研究的計畫無疑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于道泉從 1928 至 1934 年在史語所任助理研究員期間，曾多次受陳寅恪與傅斯年等史語所前輩提攜；更由於傅斯年本人的敦促，于道泉在 1930 年完成了《第六代達賴喇嘛倉洋嘉錯情歌》的譯注工作，⁹⁴並在 1934 年前往

⁹² 陳述補注，《遼史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

⁹³ 林恩顯(1936-2017)曾引用過朱延豐的《突厥通史》(疑即突厥通考)以及〈瞰欲谷、闕特勤及苾伽可汗三碑文〉等未刊稿，見：林恩顯，《突厥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 334、336。

⁹⁴ 于道泉編注，趙元任記音，《第六代達賴喇嘛倉洋嘉錯情歌》(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按：今日藏學界認為所謂《倉洋嘉錯情歌》應並非全為六世達賴喇嘛本人所作，其中當有偽托之作。另藏文中所謂 *mgur glu*，並不是今人所理解的「情歌」(love song)，而是具有宗教意味的「道歌」。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Tshangs dbyangs rgya mtsho, 1683-1706)是西藏歷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由於西藏、清朝與準噶爾之間錯綜複雜的政治鬥爭，康熙帝(1661-1722 在位)最終否定承認倉央嘉措為六世

海外進修。⁹⁵那麼究竟為何于道泉不願意回到曾經提供良好研究環境的史語所呢？

根據後人追述于道泉在 1980 年代的回憶，于氏在史語所工作期間，曾經想編纂藏漢佛教辭典，但並未獲得傅斯年的同意，主要由於陳寅恪認為當時于道泉尚未具備足夠的梵藏文與佛教知識，尚不具備編纂辭典的能力，而于道泉在晚年也對於陳、傅兩人當年的建議表示同意。⁹⁶關於編纂藏文辭典一事，于道泉與傅斯年曾在 1944 年的書信往返中有過激烈的爭辯。

1944 年前後，傅斯年曾多次催促于道泉返國服務，然後于氏並沒有答應。1944 年 1 月 24 日，于道泉曾寄給傅斯年一封措辭強硬的長信，信中痛批傅斯年阻撓其編纂藏漢辭典一事，並將協助編輯辭典的李永年發瘋一事歸咎於傅斯年。于道泉在信中，暗諷傅斯年為收買科學研究者的「資本家」，並稱「吾願在如蘇俄之國家作一無名之小卒，不願在⁹⁷重慶治下之中國受虛妄之推崇」，又言「先生之心理使余百

達賴喇嘛，清軍並藉西藏內亂將其從拉薩押往北京。倉央嘉措最終在押解途中離奇在青海一帶圓寂，隨後清軍將其屍骨拋棄，清廷並系統性銷毀其相關史料，自此其生平成為西藏歷史上的一個謎團。近年學者通過滿、蒙、藏與西文耶穌會士史料，試圖重構倉央嘉措的生平與西藏近三百年命運之關係。參：Ling-wei Kung, "The Secret History of Tibet: The Mindstream Transference from the Fifth to the Sixth Dalai Lamas and its Manchu-Mongolian Translations in the Qing Archives," paper presented at "Beyond Empire and Border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Qing Dynasty and Inner Asia," Columbia University, October 6, 2017.

⁹⁵ 王邦維，〈于道泉先生小記〉，收入杜正勝、王汎森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 559-564。

⁹⁶ 王邦維，〈于道泉先生小記〉，頁 561。

⁹⁷ 此處原有一「如」字，為于道泉刪去。

思莫解，余之心理或亦為先生所不能了解，兩人既生活於兩個整個不同之世界，即使余勉強回國，恐亦不易有合作之可能也。」⁹⁸傅斯年在接獲此信後勃然大怒，並在 1944 年 8 月 3 日回信于道泉，對於氏的指責一一回擊，並批評于道泉不能在對日抗戰時歸所服務共赴國難，獨留妻子在中國受苦。⁹⁹傅斯年並同時將信件轉給于道泉的妹夫李安宅(1900-1985)，痛陳于道泉白領參謀部與史語所之高額津貼，枉費其栽培之苦心。傅斯年指出當時和于道泉約定前往巴黎留學，主要有三項工作「通習語言學」、「調查各圖書館西藏文獻目錄」與「遍求西人治此學之成績」，而于道泉卻背約擅自前往德國，又拒不返國服務。傅斯年最後甚至認為「此等事只能說是彼之神經病，否則不堪說矣」，¹⁰⁰至此兩人正式決裂；而陳寅恪當年曾向傅斯年擔保「斷不至為羊公不舞之鶴，請放心用」¹⁰¹的于道泉，至 1949 年方返回中國，終不能為史語所所用。陳寅恪最初向傅斯年推薦于道泉進而為史語所引進語文學人才的願景，也因為中國近代知識界政治立場以及意識形態的對立與分化，最終未能徹底實現。

⁹⁸ 〈于道泉函傅斯年〉，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1944 年 1 月 24 日，李 14-24-4。于道泉與傅斯年的決裂，很可能與其親共之政治立場有關。于道泉之妹于若木(1919-2006)在 1938 年與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1905-1995)結婚後，陳雲與于道泉於 1939 年有過直接通信，並曾試圖從延安將一些中共的出版物寄給人在倫敦的于道泉。陳雲與于道泉的通信，參：王堯編，《平凡而偉大的學者》，頁 442-443。

⁹⁹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編，《傅斯年遺札》第 3 卷，頁 1509。

¹⁰⁰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編，《傅斯年遺札》，第 3 卷，頁 1511-1512。

¹⁰¹ 〈陳寅恪致函傅孟真〉，收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某年某月 24 日，元 4-6。陳寅恪，《書信集》，1929 年某月 24 日，頁 23。

六、結語：將來必有為之者——內亞史及語文學的未來展望

如前文所述，陳寅恪在史語所工作的初期，曾經希望能夠繼續王國維未完的事業，利用滿、蒙、藏文等多語種史料完成《蒙古源流》的校注工作，並推進梵藏漢佛經與內閣大庫檔案等多語種史料的研究。然而這些弘大的願望，隨著 1937 年中日戰爭的爆發受到嚴重的打擊，而終究毀於陳寅恪個人在 1938 年越南丟失手稿一案以及 1944 年傅斯年與于道泉等人的交惡。1942 年陳寅恪在寄給劉永濟的信中，回顧 1938 年在越南丟失重要手稿一案時曾謂「今雖失去，將來必有為之者」。¹⁰²在史語所成立逾九十年，陳寅恪逝世已半世紀的當下，今人一方面緬懷前輩所留下的學術貢獻，一方面也當思考如何繼承並發揚先賢未竟的事業。自二十世紀初以來，王國維、陳寅恪與傅斯年等前輩學人念茲在茲的內亞史與語文學，在今日的學術語境中究竟該何去何從？這應當是今日有識者所值得深思的問題。

陳寅恪早年對於多語種佛經比勘之學，曾用功頗深，然而其始終為無法得到各種語文的《大藏經》所困擾。早在 1923 年〈與妹書〉中，陳寅恪就曾說道：「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續藏兩部，及日本印中文續大藏……若不得之，則不能求學。」¹⁰³1929 年，陳寅恪通過于道泉得知有人盜賣蒙古文《丹珠爾》，雖立即致書傅斯年請史語所撥款購買，然而此書終究流落東瀛而為羽田亨所得。1938 年在西南聯大教授「佛經翻譯」時，陳寅恪又因手頭無漢文《大藏經》可用，因此致書勞榘與陳述等史語所同僚求助。如今數十載過去了，隨著資訊科技的

¹⁰² 陳寅恪，《書信集》，1942 年 9 月 23 日，頁 244-245。

¹⁰³ 陳寅恪，《書信集》，頁 2。

突飛猛進，今日的研究者只要通過網際網絡，便可以隨時通過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的系統檢索漢文《大藏經》全文。¹⁰⁴而佛教數位資源中心(BDRC)，除了已將藏文《大藏經》與各種藏文文獻共 1 千 5 百萬頁全部掃描並提供線上瀏覽之外，近年更積極將數位化範圍拓展至梵文與巴利文。¹⁰⁵不僅如此，近年來蒙古文與滿文《大藏經》更是已經全套拍照印刷出版，為相關研究提供了進一步的可能性。¹⁰⁶這些研究資源的進步或許都是陳寅恪當年所無法逆料的。

隨著研究材料與參考工具的擴展，陳寅恪過去所關注的內亞語文研究以及多語種佛教文獻學等相關課題，近來仍有研究者持續關注。陳寅恪在從事多語佛經比勘之學時，對兩部佛典尤其關注，其一為《金剛經》。1923 年陳寅恪〈語妹書〉嘗謂：「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注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¹⁰⁷陳寅恪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期間，也曾經講授過「梵文(金剛經研究)」課程。受到陳寅恪關於《金剛經》研究的啟發，近年也有學者通過對勘滿、蒙、藏、梵四種語文的《金剛經》，討論清代滿文譯本的語文特色及其背後所反映清朝之滿洲本位政策。¹⁰⁸

此外，陳寅恪又曾頗為關心《楞嚴經》，尤其是其中的咒語部分。

¹⁰⁴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 <http://www.cbeta.org/>, 擷取日期: 2018 年 8 月 14 日。

¹⁰⁵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https://www.tbrc.org/>, accessed August 14, 2018.

¹⁰⁶ 《蒙古文大藏經》編委會,《蒙古文大藏經》(*Yanjūur; Danjūur*)(呼和浩特: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故宮博物院,《滿文大藏經》(*Manju hergen i ubaliyambuha amba g'anjur nomun*)(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2)。

¹⁰⁷ 陳寅恪,《書信集》,頁 2。

¹⁰⁸ 孔令偉,〈《金剛經》滿文譯本初探——論滿洲本位政策與清代譯經事業〉,收入沈衛榮編,《文本中的歷史——藏傳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傳播》(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 2012), 頁 455-496。

陳寅恪晚年雖自稱「捐棄故技」，然而其在《柳如是別傳》中，仍是觸及了《楞嚴經》的相關問題，並提到了念念不忘的佛經比勘之學：

至楞嚴經，寅恪十餘歲時，已讀牧齋所作之蒙鈔，¹⁰⁹後數年，又於紹氏見一舊本蒙鈔，上鈐牧齋印記，亦莫辨其真偽。近數十年來，中外學人考論此經者多矣。大抵認為偽作。寅恪曩時與鋼和泰君共取古今中外有關此經之著述及乾隆時滿蒙藏文譯本參校推繹，尤注意其咒文，是否復原後，合於梵文之文法及意義。因此得一結論，即此經梵文間譯之咒心，實非華人所能偽造。然其前後諸品，則此土文士摭取開元以前關於阿難摩鄧伽女故事譯文，融會而成。故咒心前後之文，實為偽造，非有梵文原本。譬如一名畫手卷，畫雖是真，而前後題跋皆為偽造。由是言之，謂此經全真者，固非。謂其全偽者，亦未諦也。當寅恪與鋼君共讀此經之時，並偶觀賞小雲君演摩登伽女戲劇。今涉筆及此，回思前事，又不覺為之一嘆也。¹¹⁰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的這段案語，提及其與梵文學者鋼和泰共解〈楞嚴咒〉一事，並認為《楞嚴經》的咒心確有其梵文依據，並非憑空作偽。近年來學者曾通過比對敦煌漢藏文文獻、西夏黑水城文書、遼金房山石經、元代河西僧人譯文以及清代滿蒙漢藏四體等各種版本之〈楞嚴咒〉相互對勘，以梳理其文獻流傳及演變之源流。¹¹¹

除了多語種佛教文獻外，陳寅恪入職史語所初期，亦強調利用《內

109 即錢謙益(1582-1664)所著《大佛頂首楞嚴經疏解蒙鈔》。

110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頁179。

111 孔令偉，〈《楞嚴咒》與《大白傘蓋陀羅尼經》在乾隆《大藏全咒》中的交會——兼論乾嘉漢學之風的「虜學」背景〉，收入沈衛榮編，《漢藏佛學研究——文本、人物、圖像和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3），頁640-650。

閣大庫檔》等清代多語種文書來進行歷史研究。在這個方面，近年學者亦受到陳寅恪治學方法的影響，因此陸續整理、翻譯《內閣大庫檔》與《理藩院滿蒙文題本》中關於清代甘肅、青海地區藏傳佛教寺院的相關記載，進一步結合漢、藏文史料，探討明末清初西北地緣政治的變遷。¹¹²除了利用清代多語種檔案研究西藏史地外，近年學者又曾先後利用《理藩院滿蒙文題本》研究清代蒙古喇嘛的法律審判問題；¹¹³以及通過新疆新發現的藏文寺院文書與托忒蒙古文史書探討十八世紀土爾扈特、西藏與清朝之間的跨歐亞網絡。¹¹⁴以上相關課題在為清史研究開拓多語種史料的同時，亦推動了陳寅恪早年所關注的蒙藏歷史語文研究。

陳寅恪早歲精研清代《蒙古源流》之蒙藏文史原，近年亦有學者繼承其志，從事蒙古文《十善法白史》(*Arban buyantu nom-un čayan teike*)與藏文《拉達克王統史》等蒙藏文史籍的相關研究。《蒙古源流》曾直接參考《十善法白史》的內容，而《十善法白史》作為早期提出「政教二道」(蒙 *törö šasin qoyar*; 藏 *chos srid lugs gnyis*)的蒙古文史籍，其思想對

¹¹² 孔令偉，〈洮岷藏傳佛寺入清之興衰及其背後的蒙古因素——以《內閣大庫檔》與《理藩院滿蒙文題本》為核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6：4(臺北，2015.12)，頁 855-910。Ling-wei Kung, "Transformation of Qing's Geopolitics: Power Transitions between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Amdo, 1644-1795,"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45 (April 2018): 110-144.

¹¹³ 孔令偉，〈國法與教法之間——清朝前期對蒙古僧人的禁限及懲處——以《理藩院滿蒙文題本》中蒙古僧人坐罪案例為核心〉，《歷史人類學刊》，15：2(香港，2017.10)，頁 187-220。

¹¹⁴ 孔令偉著，村上信明譯，〈18世紀におけるオイラト=イフプレー・チベット・清朝間のネットワーク——新疆新発見のチベット語文書を中心に〉，《*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 13 (July 2017): 11-24. 池尻陽子，〈內陸アジア〉，《史學雜誌》，127：5(東京，2018.5)，頁 273。

於《蒙古源流》的全書架構有著深刻的影響。近年有學者探討了自《十善法白史》以降蒙古文獻中「五色四藩」(tabun öngge dörben qari)佛教宇宙觀的形成以及對藏文文獻的影響。¹¹⁵至於陳寅恪個人所認為的「咖喇卜經」，即 1866 年施拉君特懷特所刊行的《拉達克王統史》，近年學者曾通過清廷與拉達克之間的滿文、藏文與波斯文檔案補充並考訂此書的內容，進一步由全球史的視角闡釋清代中國如何通過來自拉達克、西藏的多語種情報認識印度莫卧儿(Mughal)、伊朗阿夫沙爾(Afsharid)乃至阿富汗杜蘭尼(Durrani)等周邊帝國勢力的消長，並以試圖以此課題為例溝通清史、內亞史乃至比較帝國史(comparative imperial history)研究。¹¹⁶

以上列舉學界近年之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是為了彰顯陳寅恪早年於史語所工作時所提出重視內亞文字研究及語文學方法，進一步提出相關議題未來發展之願景以及反思。陳寅恪於〈《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肯定王國維「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的學術貢獻，¹¹⁷而他本人亦強調通過語文學的方法比較傳世漢文文獻與梵、藏、蒙、滿文等過去中國史學者所未關注之新材料。然綜觀兩人的具體學術業績，王、陳之所以皆重視「異族之故書」，其核心關懷仍是冀圖藉由研究新史料來突破中國史上的重大問題，如兩人先後致力於研究《蒙古源流》，主要是為了補《元史》之不足。俞大維曾憶及陳寅恪未能克竟其蒙古史研究的懸念：「他既無安定的生活，又無足夠的時間，未能完成他的心願，留給我們一部新蒙古史，只倉促寫成《唐

115 烏雲畢力格、孔令偉，〈論「五色四藩」的來源及其內涵〉，《民族研究》，2016：2(北京，2016.3)，頁 85-97。

116 孔令偉，〈1724-1768 年間拉達克、西藏與清廷間的歐亞情報網——以清代中國對莫卧兒帝國的認識起源為核心〉，《清史研究》，2018：2(北京，2018.5)，頁 27-48。

117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收入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47。

代政治史述論稿》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在他看來不過是整個國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他平生的志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¹¹⁸由此可見，對於陳寅恪而言，中國史研究整體才是他治學的終極關懷。

對於陳寅恪而言，語文學乃至於內亞研究本身，似乎僅是作為建構中國通史的參考工具，因為他的終極關懷仍是中國史的整體性，而這與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學界的時代背景不無關係。然而就今日乃至於未來史學思潮的發展而言，內亞史是否僅只是依附於中國史框架下的附屬學科，值得進一步反思。誠如陳寅恪所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¹¹⁹新史學的發展與新材料、新問題以及新思潮的推進有著緊密的關聯。在今日全球化的國際社會，內亞史以及語文學研究已不僅是中國史研究框架下的一部分，而更應該是全球史乃至於世界文明的一部分。相較於王國維、陳寅恪以「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為動機，將內亞視為與中國相對的他者，未來的研究者在發揚陳寅恪學術遺產的同時，也應該反思過去東方語文學將研究對象異化為他者的傾向。

綜觀上述陳寅恪早年通過東方語文學之治學心路以及在史語所的學術經歷，並結合近年史學界相關研究成果，本文在闡發陳寅恪學術遺產的同時，亦希冀為內亞史以及語文學研究的未來尋求定位。從這個角度出發，後學無論是從事多語種佛經比勘，內閣大庫等清代多語檔案，抑或是各種蒙藏史籍的相關研究，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繼承著陳寅恪九十年前未竟之志業。然而後人在繼承、發揚陳寅恪早年所強

118 俞大維，〈懷念陳寅恪先生〉，收入張杰、楊燕麗編，《追憶陳寅恪》，頁9。

119 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收入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66。

調的東方語文學研究的當下，如何通過全球史(global history)以及世界語文學(world philology)¹²⁰的視野重新尋找內亞史以及語文學的知識定位，將是無可避免的思想議題。「今雖失去，將來必有為之者」，有識者若能同心奮起，與國際學人攜手振興內亞史及語文學之學統，先哲九泉之下，或可寬慰。

(本文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收稿；2019 年 11 月 15 日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 2018 年 9 月 7 日王明珂院士主持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九十週年所慶系列活動「民族、族群與社群的研究反思」研討會。本文徵引之檔案史料，承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協助調閱館藏。筆者寫作與修改期間，曾先後獲日本臺灣交流協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獎以及日本國際交流基金(The Japan Foundation)日本研究獎資助，承中砂明德教授接待為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外國人共同研究員，並蒙追手門學院大學承志(Kicengge)教授、九州大學小林亮介教授與京都大學羽田紀念館大崎紀子博士協助。本文之改訂，幸得二位匿名審查人賜政。謹此致謝。本文定稿於 2019 年 10 月 7 日，適逢陳寅恪先生逝世五十週年，謹以拙作致敬。

¹²⁰ Sheldon Pollock, Benjamin A. Elman, and Ku-ming Kevin Chang eds., *World Phil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大阪每日新聞》(大阪)。
- 《北京大學日刊》(北京)。
- 《國立清華大學校刊》(北京)。
- 《清華週刊》(北京)。
- 《蒙古文大藏經》編委會，《蒙古文大藏經》，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 于道泉編注，趙元任記音，《第六代達賴喇嘛倉洋嘉錯情歌》，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
-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整編史語所檔案》。
- 內藤虎次郎，《研幾小錄——一名支那學叢考》，東京：弘文堂，1928。
-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編，《傅斯年遺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
- 王國維，《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 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繼祖審訂，《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 王應憲編校，《現代大學史學系概覽(191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永瑤等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據萬有文庫本排印。
- 石濱純太郎，〈京都帝國大學所藏蒙文丹殊爾記〉，收入桑原博士還曆記念祝賀會編，《東洋史論叢——桑原博士還曆記念》，東京：弘文堂書房，1931，頁 469-476。
- 宇妥·元丹貢布(G.yu thog yon tan mgon po)等著，李永年譯，謝佐校，《四部醫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3。
- 寺本婉雅譯註，〈唐蕃會盟碑文〉，《大谷學報》，10：3(京都，1929.9)，頁 101-139。
- 羽田亨，《元朝駅伝雜考》，東京：東洋文庫，1930。
- 李思純，〈柏林留別陳寅恪〉，《學衡》，22(南京，1923.10)，頁 88。
-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藏，《長慶二年唐蕃會盟碑文》，拓本，編號：TOU1502X-TOU1506X。
- 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圖書館藏，內藤湖南拍攝，《滿文老檔》，1905 年盛京崇謨閣原

版照片。

故宮博物院，《滿文大藏經》，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張杰、楊燕麗編，《追憶陳寅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筼》，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1(北平，1930.5)，頁 1-5。

陳寅恪，〈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經考釋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4(北平，1932)，頁 404-405。

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1(北平，1931.8)，頁 39-48。

陳寅恪，〈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北平，1931.4)，頁 281-282。

陳寅恪，〈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北平，1931.4)，頁 302-309。

陳寅恪，〈蒙古源流作者世系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北平，1931.4)，頁 310-311。

陳寅恪，〈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北平，1930.6)，頁 125-129。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陳寅恪，《書信集》，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陳寅恪，《寒柳堂集》，收入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陳寅恪著，陳美延編，《陳寅恪先生遺墨》，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5。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

- 1(廣州, 1928.10), 頁 3-10。
- 傅斯年著, 傅孟真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 陳槃等校訂增補, 《傅斯年全集》, 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1980。
- 傅斯年著, 歐陽哲生主編, 《傅斯年全集》, 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 羅久芳編, 《五四飛鴻——羅家倫珍藏師友書簡集》, 天津: 百花文藝出版社, 2010。
- 羅福頤輯, 《滿洲金石志》, 收入《歷代碑誌叢書》, 第 23 冊,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8, 據 1937 年滿日文化協會刊本影印。
- Kowalewskit, Joseph Étienne. *Dictionnaire mongol-russe-français*. Kasan: Impr. de l'Université, 1844-1849.
- Meillet, Antoine et al. *Indian Studies in Honor of Charles Rockwell Lanm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 Pelliot, Paul. "Chronique." *T'oung Pao* 23:4 (October 1924): 284-285.
- Schlagintweit, Emil. *Die Könige von Tibet: von der Entstehung königlicher Macht in Yárlung bis zum Erlöschen in Ladák*. München: Verlag der k. Akademie, 1866.
- Schmidt, Isaac Jacob. *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 und ihres Fürstenhauses, verfasst von Ssanang Ssetsen Chungtaidschi der Ordos*. St. Petersburg: Gedruckt bei N. Gertsch, 1829.
- Sieg, Emil, Wilhelm Siegling, and Wilhelm Schulze. *Tocharische Grammatik, im auftrag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31.
- Staël-Holstein, Alexander von. *The Kāçyapaparivarta: A Mahāyānasūtra of the Ratnakūṭa Class*.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6.

二、近人論著

- 孔令偉, 〈《金剛經》滿文譯本初探——論滿洲本位政策與清代譯經事業〉, 收入沈衛榮編, 《文本中的歷史——藏傳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傳播》, 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 2012, 頁 455-496。
- 孔令偉, 〈《楞嚴咒》與《大白傘蓋陀羅尼經》在乾隆《大藏全咒》中的交會——兼論乾嘉漢學之風的「虜學」背景〉, 收入沈衛榮編, 《漢藏佛學研究——文本、人物、圖像和歷史》, 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 2013, 頁 640-650。
- 孔令偉, 〈1724-1768 年間拉達克、西藏與清廷間的歐亞情報網——以清代中國對莫臥

- 兒帝國的認識起源為核心》，《清史研究》，2018：2(北京，2018.5)，頁 27-48。
- 孔令偉，〈洮岷藏傳佛寺入清之興衰及其背後的蒙古因素——以《內閣大庫檔》與《理藩院滿蒙文題本》為核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6：4(臺北，2015.12)，頁 855-910。
- 孔令偉，〈國法與教法之間——清朝前期對蒙古僧人的禁限及懲處——以《理藩院滿蒙文題本》中蒙古僧人坐罪案例為核心〉，《歷史人類學刊》，15：2(香港，2017.10)，頁 187-220。
- 孔令偉著，村上信明譯，〈18 世紀におけるオイラト=イフプレー・チベット・清朝間のネットワーク——新疆新発見のチベット語文書を中心に〉，《*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 13 (July 2017): 11-24.
- 王邦維，〈于道泉先生小記〉，收入杜正勝、王汎森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 559-564。
- 王啟龍編著，《鋼和泰學術年譜簡編》，北京：中華書局，2008。
- 王堯編，《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白鳥庫吉，《塞外民族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0。
- 江上波夫，《東洋学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
- 池尻陽子，〈內陸アジア〉，《史學雜誌》，127：5(東京，2018.5)，頁 273。
- 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論・西域文化史》，東京：平凡社，1992。
- 李慧敏，〈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緣起〉，《檔案季刊》，8：2(臺北，2009.6)，頁 46-55。
- 那珂通世譯注，《成吉思汗實錄》，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07。
- 季羨林，〈從學習筆記本看陳寅恪先生的治學範圍和途徑〉，收入季羨林，《季羨林文集》，第 6 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頁 272-285。
- 林恩顯，《突厥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 林偉，〈陳寅恪的哈佛經歷與研習印度語文學的緣起〉，《世界哲學》，2012：1(北京，2012.1)，頁 137-152。
- 桑兵，《學術江湖——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 烏雲畢力格、孔令偉，〈論「五色四藩」的來源及其內涵〉，《民族研究》，2016：2(北京，2016.3)，頁 85-97。

- 張谷銘，〈Philology 與史語所——陳寅恪、傅斯年與中國的「東方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7：2(臺北，2016.6)，頁 375-460。
- 張國剛，〈陳寅恪留德時期柏林的漢學與印度學——關於陳寅恪先生治學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識〉，收入胡守為編，《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 210-219。
- 陳述補注，《遼史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
- 陳懷宇，《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中國近代人文學的東方學與西學背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 劉經富，〈陳寅恪未刊信箋整理箋釋〉，《文史》，2012：2(北京，2012.5)，頁 229-255。
- 劉錚雲，〈舊檔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現況〉，《新史學》，9：3(臺北，1998.9)，頁 135-162。
- 歐陽哲生，《傅斯年一生志業研究》，臺北：秀威資訊，2014。
- 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 1911-1929——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 Cannon, Garland and Kevin Brine. *Objects of Enquiry: The Life, Contributions, and Influences of 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4*.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 Kung, Ling-wei. "Transformation of Qing's Geopolitics: Power Transitions between Tibetan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Amdo, 1644-1795."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45 (April 2018): 110-144.
- Kung, Ling-wei. "The Secret History of Tibet: The Mindstream Transference from the Fifth to the Sixth Dalai Lamas and its Manchu-Mongolian Translations in the Qing Archives." Paper presented at "Beyond Empire and Border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Qing Dynasty and Inner Asia." Columbia University. October 6. 2017.
- Pollock, Sheldon, Benjamin A. Elman, and Ku-ming Kevin Chang eds. *World Phil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Sinor, Deni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Turner, James. *Philology: 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Wang, Qilong.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and His Sino-Indian Institute." *China Tibetology* (English Version) 2014:1 (March 2014): 12-48.

Wang, Qilong, and Deng Xiaoyong, *Academic Knight between East & West: A Biography of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Asia, 2014.

三、網路資料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 , <http://www.cbeta.org/>, 擷取日期：2018年8月14日。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https://www.tbrc.org/>. Accessed August 14, 2018.

Chen Yinke and Oriental Philology: A Reflection on the Future of Inner Asian History and Philology

Ling-wei Kung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Chen Yinke (1890-1969) is a monumental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He studied abroad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he acquired Manchu, Mongolian, Tibetan, and Sanskrit. After he returned to China in 1926, Chen Yinke first introduced the European tradition of philology to Chinese academia. When Academia Sinica established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in 1928, Chen Yinke was invited to join the Institute by Fu Sinian (1896-1950) immediately. Chen and the Institute maintained a profound relationship since that point. While he worked at the Institute from 1928 to 1937, Chen Yinke actively embarked on studying multilingual literature with philological method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historical issues that previous Chinese scholars could not address. His academic contributions, including researching *Erdeni-yin Tobči*, comparing Sanskrit and Tibetan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organizing the archives of the Grant Secretariat, established the dominant paradigms in these fields. By examining Chen Yinke's letters, notes, and manuscripts,

as well as the archive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in the Fu Sinian Library,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Chen Yinke's dedication to oriental philology and discusses his academic connections with the Institute.

Keywords: Inner Asian history, Philology, Chen Yinke, Fu Sinia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t Academia Sinica